



邹长铭作品选集

无为斋笔记

WU WEI
ZHAI
BI JI

文史 | 邹长铭◎著

回望苍茫，我问自己：痛苦吗？痛苦。庆幸吗？庆幸。消沉吗？有一点。放弃吗？尚未放弃。我近乎偏执地认为：我还能表达我企图表达的一切，我还能写一些能让我会心一笑的真正属于我的文字。毕竟我还活着，活在政通人和的当下，活在盛世清平的中国。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邹长铭作品选集

无为斋笔记

WU WEI
ZHAI
BI JI

文史 | 邹长铭◎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为斋笔记 / 邹长铭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4

(邹长铭作品选集)

ISBN 978-7-222-10804-2

I. ①无… II. ①邹… III. ①杂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6750 号

责任编辑: 段兴民 赵 红

装帧设计: 陶汝昌

责任校对: 范 可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名	无为斋笔记
作者	邹长铭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5.5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	昭通新侨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0804-2
定价:	39.00 元

目 录

阅读昭通

评述与思考

——我读昭通历史文化及其研究……………(2)

走过乌蒙

——宋元明清时期的“五尺道”及其文化表达……………(39)

豆沙关

——路的随想与写真……………(59)

向往远行

——前清、民国时期开发金沙江航运史料钩沉……………(86)

蜀身毒道与两汉时期的昭通……………(97)

朱提银与乐马厂银矿……………(106)

寰宇稀世珍 海内第一石

——汉《孟孝琚碑》……………(119)

“独一无二”的滇中墓画

——晋墓壁画……………(126)

盐津豆沙关唐袁滋摩崖纪事……………(132)

《巧家县志》总纂札记两则……………(138)

读史札记

昆明“七·一一”惨案 70 周年祭·····	(146)
不矜小节 必累大德	
——唐继尧轶事·····	(155)
袁嘉谷轶事·····	(161)
作为文化人的龙云·····	(167)
蔡锷身边的邹炯·····	(172)
难言功过	
——陆崇仁轶事·····	(182)
阿朵土司的继承人龙绳曾·····	(186)
曾经的昭通书院·····	(194)
“小昆明”的历史记忆·····	(200)
歌谣中的悲怆·····	(205)
民国巧家县纪事·····	(209)

野史杂谈

昆明旧事·····	(224)
民谣中的云南故事·····	(263)
龙云秘史·····	(277)

别 载

我读到的陈独秀·····	(378)
堂琅文化序·····	(399)
昭通文苑赋·····	(403)
龙氏家祠修缮后序·····	(404)

阅读昭通

阅
读
昭
通

评述与思考

——我读昭通历史文化及其研究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汉孟孝琚碑出土，昭通学术文化别开生面。海内硕学宏儒如罗振玉、梁启超、杨守敬、黄膺、赵藩等，都对昭通学术文化寄予了极大的关注。此后百余年间，为发掘、整理、研究昭通传统文化，几代学人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是事实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诸多因素影响，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芸芸大众，对几代学人特别是前代学者的文化品格、学术情怀、学术成果，并无深切的关怀和应有的了解，少崇仰归宿之心，无向学叩门之意。文化精英形象的丢失，对昭通文化的传承和文化心理的健康发展，将产生可怕的后果。

作者不敢自诩“文化”中人，极而言之也只能算个文化票友。写作本文的冲动完全缘于骨子里的故土情结。文章题为“评述与思考”，表明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评述”者，以一个普通阅读者的身份重温、再现、传达我所了解的几代学人的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并期望于“评述”的过程中再一次沐受前辈学者的“学不可以已”、“在止于至善”的熏陶；所谓“思考”者，譬如读书笔记，也对评述的人和事谈谈自己的认识、感想。如果这篇文字能在普及和提高之间、在向学者和治学者之间，起到一点补遗拾缺、牵线搭桥的作用，幸甚！

“昭通人”是“元谋人”的后裔？

作出“‘昭通人’是‘元谋人’的后裔”这一判断的，是王文光先生。

1982年11月，昭通文物普查队在例行开展的文物普查工作中，在今昭阳区北闸镇过山洞发现了一枚人牙化石；同一地点还发现了一批东方剑齿象、中国犀牛、猴、鹿等哺乳类动物化石。化石采集现场情况及标本送有关部门，经专家鉴定，哺乳类动物化石地质年代属中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距今约二三十万年；人牙化石为距今五万年至十万年之间的新人化石，按照人类学研究的命名原则，学术上命名为“昭通人”。

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把人类进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猿人、古人、新人。猿人是最早阶段的人类，其生存年代在距今五六十万年至三百万年之间，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早期和中期。这一人类进化阶段的代表，是1927年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和1891年发现的爪哇猿人化石。古人是介于猿人和新人之间的人类，生存于一二十万年以前，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文化属旧石器时代中期。1956年在法国杜塞尔多夫尼安特河流域附近洞穴中首先发现古人化石，所以在学术上把人类发展的这一阶段又称为“尼人”阶段。新人也称“智人”，意即“有智慧的人”。广义地讲，新人包括最早的更新世晚期的古人后裔直到现代的人类。1868年，在法国南部克罗马努的山洞中首先发现完整的新人化石。此后，在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也先后有新人化石发现。同时从新人文化遗址中证实，更新世晚期的新人已能制作比较精细的石器和骨器，爱好绘画、雕刻及艺术，营渔猎生活。在国内，“昭通人”和1951年在四川资阳发现的

“资阳人”属同一阶段的新人类型，绝对年代晚于克罗马努人。

“元谋人”于1965年5月发现于元谋上那蚌村，地质年代属下更新统，绝对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左右，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化石。所发现的化石为上中门齿两枚，其形态特征与北京猿人的门齿相似，但也具有一些近似猿类和南方古猿的原始特征。在化石采集地还发现少量石器和用火遗址。“元谋人”化石及其文化遗物的发现，对探索我国早期猿人的体质特征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同时说明云南是人类起源和早期人类进化的重要地区之一；但从猿人进化到古人、新人发展阶段的考古资料，在1982年以前却一直没有新的发现。“昭通人”的出现，填补了其中缺失的一环，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外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使我们对昭通历史文化的认识可能从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提前到了“昭通人”时代。

在人类学研究的范畴里，就人类进化的一般意义上来说，把“昭通人”看作“元谋人”的后裔似无不可。但王文光先生是面对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千顷池文化——作出这一判断的，在学理逻辑和实证资料的分析、研究中，就更加需要谨慎、持重、充分、科学。那么，王先生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王文光先生是关注昭通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位非昭通籍学者，在其所著《滇东北千顷池文化初论》一文中，他首先认同今昭鲁坝区在二千多年前曾有一个“周回百里”的高原湖泊，名为千顷池。进而认为，千顷池所“孕育的灿烂的千顷池文化应与洱海、滇池鼎足而三，同负盛名”，“都是云南古代的发祥地，是云南古代文化鼎足而三的支撑点，其确证是千顷池文化区内既有旧石器时代的‘昭通人’，也有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就在《初论》这篇文章中，作者对其论述的千顷池文化的空间范围界定为“滇东北……川滇黔连接地带”；时间范围则起自

旧石器时代，迄至南朝爨氏独霸南中后；文化创造主体是“昭通人”，而“昭通人”是“元谋人”的后裔。为了说明“后裔”的来历，王文光先生写下了一段“可以设想”的文字^[1]：

至今虽无更为详细的考古材料证明，但可以说“昭通人”是元谋人的后裔。现在的川西、川西南、滇中、滇东北是地质时代的所谓滇康古陆，这里是人类进化最理想的场所。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元谋人便在滇康古陆之上，而“昭通人”又是生活在元谋人之后。“西畴人”、“丽江人”、“昆明人”等晚期智人之前的早期智人。可以设想，元谋人在元谋盆地停留了很久之后，必然会在生齿日繁时向四面扩散，他们扩散的线路便是循金沙江或溯流而上或顺流而下，沿着河谷台地流动……他们中的一支沿着金沙江而下，想在今天的东川、巧家一带寻找一块合适的理想之地，就这样经过了几万年的时间他们才来到千顷池地区，因为这里有适宜他们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他们便是在千顷池文化区发现的“昭通人”。此后，“昭通人”便劳动生息繁衍在千顷池文化区，开始创造千顷池文化。

王文光先生行文落笔太过于匆忙、操切，以至于在一些常识性问题上也出现了讹误，如“晚期智人”的使用，如滇康大陆“是人类进化最理想的场所”等，这也罢了。但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沿金沙江迁徙，“经过几万年的时间”到达千顷池地区，成为5万年前的“昭通人”的祖先这一论断，既无古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支持，更无考古材料证明，在文化史上也很难找到文化丛络、文化特质的相似性。

“‘昭通人’是‘元谋人’的后裔”作为一种观点，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寻求学术支持并继续完善的可能性。在这里提出来讨论，是有感于在昭通传统文化研究中，到遥远而渺茫的传说、神话中寻找学术支持并据以推演、附会的倾向，似乎也正在

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有所泛滥，这不是昭通文化的传统，不是正
经的治学之道。

千顷池到底有多大？

1979 年李正清先生曾写《昆明考》一文，确认千顷池的存在，提出：“环千顷池而居的各族统称为‘劳浸靡莫’”，“众多民族居住的千顷池又名灵池”。并引《永昌郡传》：“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燮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溉种稻。”又据方国瑜先生《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千顷池周四十七里”的记述，对千顷池所在方位、大致范围、环境特征作了描述：千顷池“即今昭通、鲁甸交界之八仙海水，流入洒渔河”。当时的朱提县所在，“五六十里的平川，千顷池占去四十七里，几尽百分之九十，而川中冈条梁脊甚多，成为岛屿，将千顷池分割成数十块，浩浩荡荡汪洋如‘汉’。西汉起，在其东南的今威宁一带置汉阳县，就是因为千顷池而得名的。”（转引自^[2] 217 页）那么，“千顷池”究竟在哪里呢？李正清先生在其《朱提的由来及其它》一文中曾经认为，千顷池由昭鲁坝子中的4个海子组成，其一为“八仙海”，位于今昭阳城区东郊的水井洼，已在清雍正年间退海还田。其二为千顷池的正海，它东起凤凰山麓，南及今昭鲁交界的海边，西接锦屏山下打渔村，北滨今昭阳城南门，东北绕罗杉丘陵斜插到九龙山前的后海，汪洋五六十里，清嘉庆年间为疏导昭鲁大河，凿开老鸦崖，千顷池从此水泄池涸，垦殖为田。其三为永乐海，位于今昭通飞机场（水塘坝），清末泄水退海还田。其四为葫芦口，位于鲁甸县城东北，1958 年湖水被抽干，现仍留沼泽数百亩^[3]。对李先生的观点，或许当时在学术界就有不同意见，但未见展开公

开讨论。

继后，关于昭通地方史和传统文化的研究日渐深入，在诸多研究论文中，“千顷池文化”和“千顷池文化区”概念的论述尤为引人注目。千顷池既然已被用作昭通传统文化表征性的学术符号，并据以界定它的时间、空间分布、创造主体，据以分析它的文化丛络、文化特质、影响和地位，千顷池是否确实存在，如果存在，其时间、空间分布又当如何，便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学术界讨论的范围——在昭通传统文化研究中，这是一次极为难得、十分有益的讨论，笔者真诚地感谢参与讨论的各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昭通需要这样的学术情怀、学术氛围、学术品格。

较早提出“千顷池文化”概念的是谢本书先生，他在《爨论》一文中说，“一千年前，在云南境内，除滇池、洱海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湖泊，名曰‘千顷池’。顾名思义，即有上千顷面积的大湖(池子)，这就是在今天昭通、鲁甸之间的昭鲁坝子(又称昭鲁盆地，面积525平方公里，海拔1900~2000米，是云贵高原的第四大坝子)。千年前，这里地势低洼，积水盈尺，周围数千顷，故名‘千顷池’。在这里产生的文化，可称之为‘千顷池文化’。”在这篇文章中，谢先生是把千顷池文化作为爨文化的一翼而提及的，故未作具体的界定和深入的论述，但也表明了两个重要观点：其一，在文化源流上，以汉孟孝琚碑和东晋壁画为代表的“千顷池文化产生于爨文化之前”；其二，至爨氏统治南中后，千顷池文化汇入了爨文化^[4]。

继而，1991年王文光先生在《昭通师专学报》发表《滇东北千顷池文化初论》，文中对千顷池的存在和范围的表述，援引的大体是李正清先生的观点。作者认为：千顷池文化是“元谋人”的后裔“昭通人”在“千顷池文化区”开创的，“是一种以土著

文化为基础的多元复合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千顷池文化是百越文化在云南分布的最北端”。并进而大胆假设：“千顷池文化区的原始土著中的一部分曾在杜宇的带领下，与巴蜀土著共同创造了巴蜀文化。”对千顷池文化的兴衰，作者也作了大致的勾勒：“汉置郡县使千顷池文化在汉代进入全盛时期，其特征是先进的稻作农耕和发达的青铜冶金手工业，但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千顷池文化中汉文化比例增加，多元复合文化消退；晋以后战乱四起，大多发生在朱提境内从而使千顷池文化衰落；南朝以后爨氏独霸南中，千顷池文化区进入了第一个自我封闭的时期。”^{〔1〕}

徐波是一位在昭通出生、在昭通成长的青年学者，对“千顷池文化”和“千顷池文化区”概念的提出持赞同的观点。出于对衣胞之地的特殊情感，在面对特定的“这一个”研究对象时，他无法保持一种克制、冷静和应有的疏离，而是满怀激情、满怀热望地走进了千顷池文化，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先后发表了《历史时期中千顷池文化区域在西南及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暨作用》、《千顷池文化界定诸问题研究》、《论千顷池文化之经济特质》、《千顷池文化解疑——答陈孝宁先生》等多篇论文，围绕千顷池文化的界定、历史分期、地域消长、文化载体、政治经济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极为认真的探讨。徐波认为：“从时间上看，千顷池文化是一个历史文化范畴，指的是自先秦至汉晋时期千顷池境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和，以及此期间其文化涵盖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之和。”千顷池文化在其积淀孕育、发展兴盛、式微衰变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两个高峰期、两个低谷期。即：杜宇族活跃的时代，是千顷池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期。千顷池百平方里的水面及湖滨环境，为杜宇族发展农、牧、渔、猎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其拥有先进的经济，强大的武力，得以

北跨长江，入主蜀中，“千顷池进步的农业文明也随之北移，植入蜀文化之中”。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是千顷池文化的第一个低谷区。此期，虽然杜宇时代千顷池文化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影响已不复存在，但千顷池文化仍是西南夷诸文化中最进步的文化之一。两汉时期，是千顷池文化的第二个高峰期。先进的农耕文明，以银铜矿冶为代表的先进的手工业和繁荣的商业贸易，由郡县制、“邇邛”联盟、夷汉部曲所形成的特殊的政治经济生活方式，开爨文化政治运行机制的先河。东晋南北朝时期，是千顷池文化第二个低谷期及衰变期。战乱频仍，南中大姓外迁，与中原经济、政治联系减弱，千顷池文化渐趋衰落，最终被纳入新兴的爨文化轨道。

徐波认为：“从空间上看，千顷池文化是一个地域文化范围。其中心区域为云南东北及滇、川、黔三省结合部，而随实力、影响的消长，其涵盖面、辐射区在不同时期也颇有张缩。具体而言，作为一个地域文化概念的千顷池文化，系以云南东北千顷池(今云南昭鲁坝子)滨湖地区为核心，包括与其相邻结的川南、黔西的川、滇、黔边高原湖泊文化。其主干区域包括金沙江东岸以今昭通境域为核心，南起云南的会泽、东川、宣威，北至长江北岸作为长江与金沙江分界点的四川宜宾市及宜宾以南的高县、珙县、兴文、长宁、筠连、叙永，东达贵州的威宁、毕节、赫章的这样一个竖卵形地带。……当其盛时，受其直接影响和辐射的范围北上巴蜀地区，南达整个滇中、滇南，东及黔西地域，其铜银产品及其它物资的输出对全国财政、经济有重要影响。”

徐波认为：千顷池文化区域对西南及国家经济生活的重要影响表现在：第一、千顷池文化区域农业经济在杜宇时代将先进的农业文明北播于蜀、巴地区，奠定了巴蜀的开发基础。在

汉通西南夷至魏晋之际，在铁器的使用和推广、锄耕旱作农业向犁耕农田农业的转变等方面，对西南夷地区农业的历史性转折发挥了先导和中介的重要作用。第二、千顷池文化区域矿冶业在国家财政史上起到了国帑支柱的作用，而“白铜”的发明，更在中国冶金史上树立了一块走向世界的里程碑。第三、千顷池文化区域在沟通中国西南、南方诸区及“南丝路”国际商道上发挥着重要的枢纽孔道作用。徐波先生坦陈：“出于为出生地做点什么的积愆，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分出部分力量用于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希望对这里的历史、文化面貌有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新的、较为清晰的解释。……据我的研究——与学术界盛行的观点不同——这一文化在长时期中保持着自己独具的特色，既不同于中原文化，也不能囊括于滇、爨和南诏、大理文化；而且，这个不大的文化区域对西南、全国乃至世界文明有过值得一提的影响。我对该文化之分期、地域、文化载体、经济特质、在西南及国家经济生活中之地位、与他文化之异同等所进行的研究和勾勒，目的在于呈示这一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特质，开拓这一新的文化研究领域。”^[5]

对“千顷池文化”和“千顷池文化区”概念的提出，有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陈孝宁先生在《“千顷池”商榷》一文中，细检史料，稽核考订，对“千顷池”的存在和范围等提出质疑：第一、“千顷池”的记载，仅见于魏晋人的著述；之前的两汉，之后的隋、唐、宋、元、明、清，在有关昭通历史的史料中，基本上见不到有关“千顷池”的记载。假若如有的论者所言“千顷池”是云南与洱海、滇池鼎足而三、同负盛名的湖泊，为什么在这样长的历史年代中竟无人提及。第二、《永昌郡传》记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池泉水，燹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溉种稻”，可见“千顷池”和“龙池”是两回事。并且文中

明明白白说的是“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池泉水”，并没有说“大池泉水”的面积纵广五六十里，至于“周回百里”、“百平方里水面”之类描述，更是没有任何依据。第三、诸书记载混乱，莫衷一是。其中很多记述，既无法从考古资料中获得支持，在地方历史文献中也找不到可供佐证的文字记载。因此，陈孝宁先生认为：在千顷池是否确实存在过、存在时间、确切地点、范围未弄清楚之前，就来讨论“千顷池”文化，缺乏必要的前提和出发点，“这好比把辉煌的理论大厦建筑在小小的一枚鹅卵石上。”^{〔2〕}

为“朱提文化”正名

为“朱提文化”正名，是潘先林先生提出来的。在其《朱提文化论》中，潘先生从另一个角度对“千顷池文化”提出质疑：“有学者将滇东北区域文化称为‘千顷池’文化，并详细推论该池在今昭鲁坝子中的地理位置……为了与滇池文化、洱海文化相对应，没有多少文化史学上的依据。”他指出：滇东北新石器文化中尚无渔业遗址，袁滋册南诏途经昭通时也无大湖的记载，元明清昭通也没有以湖泊为中心的经济文化发展带。因此，即使“千顷池”、“龙池”确实曾经存在过，“也不可能与孕育滇文化、南诏大理文化的滇池、洱海相提并论。以一个面积不大，影响不深远，且一般大众不知其名和所在地的‘千顷池’命名影响较大的滇东北区域文化是值得商榷的”。潘先林先生“将远古至南北朝时期滇东北区域繁荣一时的文化称为朱提文化”，“朱提文化上承滇文化，下接南诏大理文化，为云南文化的三大发祥地之一”。理由是：

第一、“朱提”一名最早出现于西汉，先为山名，后为县名，

再为郡名，一直沿用至唐初，共存在了近 800 年。该名称存在的时期正是滇东北区域文化繁荣、发展和延伸的时期；而且“朱提”所指的范围与滇东北区域文化的范围基本相当。因此，以“朱提”命名滇东北区域文化是适当的。

第二、朱提银铜在全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唐宋以来“朱提”成为白银的代名词，在明清笔记小说中比比皆是，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以“朱提”命名滇东北区域文化既顺理成章，又能体现该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第三、将滇东北区域文化称为“千顷池文化”缺乏文化史学上的根据。有的论者将其纳入“爨文化”范畴，但爨文化无法涵盖朱提银、铜、白铜及汉碑所表达的文化特质。“爨文化”其实是朱提文化的继续和发展。

《朱提文化论》运用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朱提文化的孕育、发展、特征、断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作者认为，作为滇东北区域文化的朱提文化，其发展进程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孕育时期，断限约当西周至春秋晚期。其文化要素是以闸心场遗址、马厂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及杜宇入蜀教民务农、保子帝南迁所表达的滇东北与巴蜀农耕文明的传播、交流。

第二个时期是繁荣期，断限约当战国初期至东汉末年。“五尺道”和“南夷道”的相继开通，朱提地区郡县设置，“募豪民田南夷”，大批汉族移民进入，朱提地区成为中央朝廷势力和汉文化进入云南的前沿。就在这一时期，随着“滇”国的灭亡，以滇池为中心的滇文化发生断裂，云南文化的中心也开始东移。到了东汉，朱提地区取代滇池地区成为云南文化发展的中心。其文化要素是：以“文齐穿龙池，溉稻田”、牛耕和铁农具使用